



## 西萨摩亚获得独立

1月1日，原由新西兰治理的西萨摩亚成为独立国家。

西萨摩亚是太平洋波利尼西亚群岛中的一个岛群，由萨瓦伊和乌波卢两个大岛以及7个小岛组成。小岛中只有阿波利马和马诺诺两个岛有人居住。1722年，荷兰航海家雅各布·罗捷文曾到达萨摩亚。1786年，法国航海家路易斯·德·布根维尔曾把萨摩亚群岛命名为“航海者群岛”。19世纪中叶，英、美、德殖民主义者相继侵入和争夺萨摩亚群岛。1889年，英、美、德之间签订了共同统治萨摩亚群岛的柏林条约。1899年3国另订新条约，英国为了和德国交换其他殖民地而把英国统治的西萨摩亚转让给德国。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新西兰对德宣战，占领了西萨摩亚。1920年，国际联盟把西萨摩亚交给新西兰“管理”。1920年至1936年，西萨摩亚掀起反对新西兰殖民统治的“马鸟”运动，提出了“萨摩亚人的萨摩亚”的斗争口号。此后群众示威游行和反抗行动不断发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联合国又把西萨摩亚作为新西兰的托管地。60年代，在世界民族独立运动的影响下，西萨摩亚人民也掀起了独立运动的高潮。经过艰巨的斗争，终于在1962

年 1 月 1 日获得独立。

独立后，由马列托亚·塔努马菲利第二和图帕阿·塔马塞·米阿利联合担任国家元首。



## 毛主席接见安井郁

1 月 3 日，毛泽东主席接见日本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理事长安井郁。同时受到接见的还有在北京的日本和平人士西园寺公一及夫人以及安井郁的女儿安井侑子等，毛泽东同安井郁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廖承志、刘宁一等也参加了接见。

安井郁先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是一个和平活动家，同时也是一个从国际法学的立场探求真理的社会科学家，对于中国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先后 4 次访问中国。安井郁先生和他所领导的日本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为反对原子弹氢弹、反对美日反动派推行核战争政策、保卫亚洲和世界和平，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对保卫亚洲和世界和平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日本的反对原子弹氢弹运动，结合着日本人民反对美国复活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国军事基地、反对日美军事同盟条约、要求收复冲绳和小笠原群岛，争取

独立、民主、和平和中立的斗争，推动日本和平运动的发展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1月4日，首都各界人士 1500多人在政协礼堂集会，欢迎安井郁理事长。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廖承志首先在会上讲了话，高度评价和赞扬了安井郁先生在日本反对原子弹氢弹运动中，在日本和平运动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并向安井郁先生表达了崇高的敬意。随后，安井郁先生在会上作了题为《日本人民争取真正独立和平的斗争必将冲破反动的浪潮获得胜利》的长篇演讲。在演讲中，安井郁先生首先提到“这次，我见到了最尊敬的毛泽东主席，得到了能够接触亲切的伟大风格的机会。毛主席对日本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要求真正独立和平的斗争给予很高的评价，并且给予鼓励，对我们提出的关于世界局势和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等问题，毛主席以深刻的理论和具体事实一一给以明确的解释。毛主席的话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心里，将永远不会消失。接着，安井郁先生向与会群众介绍了日本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阐述了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的原则，即“第一，我们认为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必须使其成为一个群众性的运动，尤其是在目前，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必须战胜严重考验的时期，更需要从群众中吸取无限的力量。如果把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从群众斗争中分割开来，使之变成知名人士聚首的茶话的运动，那么立刻会被反动的浪潮所冲垮。第二，我们认为，一旦群众认识了真相，就能发挥作为群

众运动的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的实力。”正是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日本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才发展成为一个大规模的运动，“发掘了埋藏在人民群众中的对于和平的‘无声的声音’，团结了新的要求和平的力量。”同时他还表示，回到日本之后，要同他的朋友和同志们一道，立即开始 1962 年的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并向全中国人民保证：“将同全日本、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的朋友紧密团结，经得起一切考验，坚持不懈地前进。”



## 步履维艰话老挝

1月5日，1月23日，扩大的日内瓦会议又举行了第38次、39次会议，讨论老挝局势的日内瓦会议的召开，是鉴于当时老挝国内动荡复杂的政治局势长期得不到解决，经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的倡议，日内瓦会议两主席、英苏两国建议召开有中、苏、美、英、法等14国参加的第二次日内瓦会议，讨论和平解决老挝问题。会议从1961年5月16日开始，已经历时8个月，虽经无数次的协商、讨论，但由于美国政府和受其支持的富米一文翁集团的阻挠与破坏，老挝问题一直未能得到妥善解决。

在亚洲的地图上，就面积而论，老挝所占位置不

多，但老挝在战略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毗连泰国、缅甸、中国、柬埔寨和越南。至于老挝本身，它拥有在战略上吸引美国人的查尔平原，因为可在那里驻扎足够的空军，来控制南中国和东南亚的大陆国家。当时，美国侵略集团的如意算盘是，以泰国和南越为基地，完全控制老挝，颠覆柬埔寨王国政府，包围越南民主共和国，以便霸占整个印度支那半岛，威胁东南亚和平中立国家，并进逼中国的南部边疆。因此，从 50 年代开始，就千方百计地插手老挝国内事务，企图控制老挝。

1954 年日内瓦会议后，老挝寮国战斗部队退居桑怒、丰沙全解放区。1955 年 3 月在原印支共产党老挝支部的基础上成立了老挝人民革命党，凯力·丰威汉任总书记。1956 年 1 月召开老挝民族统一战线大会，决定将原寮国自由阵线改组为老挝爱国战线党，由苏发努冯亲王任主席。1957 年 11 月该党与万象当局签订万象协议，组成了以富马亲王为首相的联合政府，但美国却支持亲美的培·萨纳尼为首的右派集团，于 1958 年 8 月 16 日推翻了联合政府，接着又包围了寮国战斗部队两个营，非法监禁了苏发努冯和爱国战线党在万象的领导人。驻扎在查尔平原的寮国战斗部队第二营几经突围才回到解放区。1960 年 5 月 23 日，苏发努冯也越狱成功，他们重新举起抗美救国的旗帜，开始了新的战斗。

1960 年 8 月 9 日，万象政府军伞兵营第二营营长贡勒上尉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亲美的右派政府，扶持富

马首相再次上台，组成老挝中立派政府。新政府宣布的对内政策主要是：恢复全国的安宁，停止老挝人之间的相互残杀，实行民族和睦；对外主要是实行真正的中立，尊重各项协议，包括日内瓦协议，接受所有国家不附带任何军事、政治条件的援助，等等。老挝政局的新发展，反映了老挝人民要求实现国内和平，维护民族独立和实行中立政策的强烈愿望，对老挝人民来说是莫大的喜讯。

与此同时，新政府的成立，引起了美国的极端仇视，千方百计要推翻新政府。9月，美国支持老挝极端亲美卖国集团头目富米·诺萨万和文翁·占巴塞在沙湾舒吉成立非法政府，并加紧增派大批军火武装富米一文翁的右派军队。12月，右派军队向万象发起进攻，中立派与爱国战线党联合进行了英勇的万象保卫战，并于1961年联合发动攻势，一举解放了全国60%的土地和50%的人口，探制了查尔平原等战略要地。富米一文翁集团的军队是一败再败，岌岌可危。这时，经西哈努克亲王的倡议，才于1961年5月16日召开日内瓦会议，讨论和平解决老挝问题。

1月5日，扩大的日内瓦会议举行第38次会议，通过两主席邀请老挝3亲王到日内瓦讨论老挝局势的信件。两主席的信中提到，组成民族团结政府是老挝的内部事务，但是可以利用老挝3种政治力量的最高领导人的到达日内瓦来完成有关组织老挝民族团结政府的各项问题的谈判。6日，日内瓦会议两主席函邀亲王去日内

瓦会谈。15、16日，富马、苏发努冯亲王抵达日内瓦时分别发表谈话与声明，宣布将努力促使联合政府早日组成。18日，日内瓦会议两主席同老挝3亲王在日内瓦举行会谈，就老挝问题的国际方面交换了意见。18日和19日，3亲王又单独举行会谈，3亲王同意民族团结政府应在苏黎世公报和欣合协议的基础上组阁，并原则同意18个席位的分配比例。但富米一文翁集团坚持无理要求，要占有国防、内政、外交等重要席位，组成民族团结政府的关键问题未获解决，3亲王的会谈破裂。

3亲王会谈破裂的原因主要是有美国做靠山的富米一文翁集团根本无意建立联合政府；他们要架空中立派富马亲王，消灭以苏发努冯亲王任主席的爱国阵线党，独掌老挝政权，此外就是美国政府的阻挠和破坏。1月11日，美国总统肯尼迪在他的国情咨文中公然宣扬：“我们要求建立一个中立、独立的老挝”，“还有待于取得监督老挝独立的可行的方案”。所谓“可行的方案”就是取消合法的富马政府，而由美国一手扶植的叛乱集团富米一文翁执掌老挝政权。这意味着美国政府决心继续干涉和分裂老挝，使老挝的和平无法得到恢复。

1月23日，扩大的日内瓦会议举行第39次会议，中国代表团代团长章汉夫在会上谴责美国企图以外交谈判掩盖军事冒险，以战争威胁达到政治讹诈的两面手法，指出富米一文翁集团坚持要掌握国防部和内政部的目的就是要消灭寮国战斗部队。苏联、越南代表说，美

国唆使富米一文翁集团阻挠和平解决老挝问题。苏发努冯亲王在 1 月 26 日离开日内瓦时发表声明，谴责美国指使叛军进攻解放区，玩弄两面手法唆使富米一文翁集团阻挠组成联合政府。要求日内瓦会议制止富米一文翁集团及幕后人的挑衅活动。

1962 年 6 月 12 日，富米一文翁集团由于进攻连连受挫，被迫与老挝爱国阵线党达成协议，3 派力量组成临时民族团结政府，老挝内战才暂告平息。

# 4

## 七千人大会

1 月 11 日至 2 月 7 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了扩大的工作会议，共有代表 7000 多人，因此又称“七千人大会”。会议由毛泽东主持，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了书面报告。

由于“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连续 3 年多的失误，国家生产和人民生活都出现了严重困难。党中央领导同志头脑逐渐冷静下来并开始在一系列会议上总结教训。1961 年 1 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以后，党在调整农村生产关系和有关政策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制定了各方面的工作条例，这些对于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克服困难，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当时



在 1962 年中共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左起）周恩来、陈云、刘少奇、毛泽东、邓小平、彭真在一起交谈。

党内“左”的指导思想还相当严重地存在着，一些同志对于经济上的严重困难缺乏足够的认识，因而在 1961 年调整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方面，很不得力，成效不大。为了总结经验教训，统一全党的认识，进一步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迅速恢复国民经济，中央决定召开一次有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参加的扩大工作会议，解决党内存在的认识分歧。1962 年 1 月 11 日，来自全国各地的干部共 7078 人走进人民大会堂。这是建国以来中央召开的规模最大的一次

工作会议，其代表的广泛性是前所未有的。这说明党中央和毛泽东本人对这次会议寄予了很大的希望。会议原定 1 月 28 日结束，因对刘少奇的（书面报告）进行讨论和修改，延长了一些时间，还因毛主席在 1 月 29 日讲话中提出了开“出气会”的建议，故会议延长，一直开到 2 月 7 日才闭幕。这次会议进程分为两个阶段，周恩来总理概括为两个高潮：

“第一个高潮”从 1 月 11 日开幕到 29 日上午，主要是围绕少奇同志代表中央作的《书面报告》，进行分组讨论和提出修改意见。《书面报告》第一稿写出来之后，还没有经过政治局讨论，毛主席即提议直接印发大会，和大家见面。毛主席认为：参加会议的有各方面人员，多数接近实际和基层，能够从各个角度提出意见来，能更好地集思广益。在大会分组讨论的同时，由少奇同志组织了一个层次很高的 21 人（报告）起草委员会，参加的有政治局成员、各大区书记，进行更加深入的讨论和研究，经过 8 天修改，于 22 日拿出第二稿。24 日，毛主席看过后，找少奇、小平同志谈话，表示“赞成这个方向”。25 日，在中南海怀仁堂，由少奇同志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第 102 次扩大会议，讨论（书面报告）第二稿。大家表示基本上赞成这个稿子，同意提交大会。

1 月 27 日，毛主席主持召开全体大会，把印好的（书面报告）第二稿发给与会者。（报告）共分 3 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目前形势和任务”，第二部分是

“关于集中统一”第三部分是“关于党的问题”。少奇同志在会上没有照本宣读，而是在大家阅读、讨论《报告》的基础上，从国际形势、国内形势、集中统一和党的作风 4 个方面，作了一些更具体、更深入的解释、说明和补充。

会议的“第二个高潮”从 1 月 29 日下午毛主席提议开“出气会”到 2 月 7 日闭幕，中心就是“出气”。会议原安排 1 月 30 日或 31 日结束，31 日晚即可离京回各地过春节。可是，到 29 日下午，许多人反映，话还没有说完，还憋着一肚子气。有的组还反映，会上还有人压制民主，不让讲话。毛主席和政治局常委同志商量，决心让大家把要讲的话都讲出来，把“气”出完。于是提议延长会期，在北京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毛主席说：“我主张集体在北京过一个春节。有这么几天相信能够解决上下通气的问题。有一个省的办法是：白天‘出气’晚上看戏 两干一稀 大家满意。我建议让大家‘出气’。不‘出气’统一不起来 没有民主 就不能有正确的集中。因为‘气’都没有出嘛！积极性怎么调动起来？到中央开会，还不敢讲话，回到地方就更不敢讲话。我们常委几个同志商量了一下，希望解决‘出气’的问题。有什么‘气’出什么‘气’，有多少‘气’出多少‘气’，不管是正确之‘气’还是错误之‘气’，不挂帐，不打击，不报复。”毛主席讲话后，当晚各中央局召开会议，部署如何开好“出气会”。1 月 30 日上午，各省召开动员会，号召大家消除顾虑，趁热打铁，

把“气”出完。

“七千人大会”初步总结了建国 12 年来特别是 1958 年以来经济工作的基本经验教训，指出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做好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强调恢复和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健全党的民主生活，加强集中统一。虽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这次会议还未能清醒地认识当时经济工作中的“左”的错误的性质及其思想根源，但对于统一全党认识，加强和巩固党的团结，进一步动员和组织全党和全国人民坚决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会议结束后，7000 名干部纷纷踏上归程，此时，他们的心情已同进京的那一刻迥然不同了，沉重的思想包袱和疑虑都先后释去，按照中央的方针，在挫折中重新奋起，已成为大家共同的心声。

## 5

## 肯尼迪的“国情咨文”

1月11日，美国总统肯尼迪向美国国会提出国情咨文。国情咨文共分：我们在国外的目标、我们的军事力量、联合国、拉丁美洲、大西洋集团、我们的支付差额、贸易等部分。以国情咨文的内容来看，它充分反映

了肯尼迪执政以来所断定和实行的美国全球战略和重要的内外政策。

首先，在国情咨文中，肯尼迪提出：“我们的基本目标仍然是这样，由自由独立的国家组成一个和平的世界大家庭——它们可以自由地选择它们自己的前途和它们自己的制度，只要这不威胁其它国家的自由”。这可以说是肯尼迪“和平战略”的核心，实质上是在实力地位基础上灵活运用文武两手称霸世界的全球战略，矛头首先对准了社会主义国家，指责共产党人“提供的是进行压迫的世界”。同时也是针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提出：“我们帮助其他新兴国家，加强它们争取自由的地位的努力也取得稳步的进展。”通过“粮食用于和平”计划“攀亲戚”运动、派遣“和平队”等手段，争取新兴的民族独立的国家，“帮助它们建设一个社会，使它们对美国的理想主义有一个概括的了解”。我们支持那些比较新的或比较弱的国家的独立”，因为“国家的独立是对共产党的‘总计划’的障碍——却是我们自己计划的基础”。为此，肯尼迪在国情咨文中提出要拨出 30 亿美元，以便向拉丁美洲加紧推行“争取进步联盟”计划，来赢得拉丁美洲人民的信任，用美国丰饶的农产品来解救众多新兴国家的饥馑。肯尼迪如此“乐善好施”的目的，就是要巩固美国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地位，把新兴的民族独立国家纳入美国的战略轨道。

其次，关于军备问题。为了以强大的军事力量推进美国的全球扩张，肯尼迪在国情咨文中说：在过去的一

年中，美国政府建造“北极星”导弹潜艇的速度和“民兵”导弹的生产能力都增加了一倍，把随时准备好在接到警报后 15 分钟内起飞的有人驾驶的轰炸机数目增加了 50%，把作好战斗准备的师的数目增加了一倍，更新了武器和弹药，增加了现役舰只，增加了战术空军……这还不够，肯尼迪还提出，在新的一年里，还要继续增加 300 枚“北极星”和“民兵”导弹，以便更迅速地达到“更高的，长期的作战准备的水平”。通过进一步的扩军备战，继续保持美国的核威慑力量，肯尼迪还声称“我们打算在任何时候都拥有抵抗非核或有限进攻的能力——用来补充而不是替代我们的核能力”。

第三，对于当时全世界瞩目的西柏林问题，肯尼迪认为西柏林是美苏对抗的焦点，决不容许西方被赶出西柏林，并要加强西柏林作为西方国家反苏、反共的宣传中心和间谍中心的作用。因此，在国情咨文中强调：“我们要留在柏林，我们要自由进入柏林，两百万西柏林人民要享有自由，这些既不会在武力下放弃，也不会由于迁就而放弃——为了保持这些权利和义务，我们准备在必要的时候谈判，在必要的时候打仗。”肯尼迪的态度之所以这样强硬，是因为他认为当时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空军、陆军和海军部队的人数和作战水平、核能力和解核能力都是非常强大的，而且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每一个成员的立场是和美国一致的。但是面对柏林墙已经筑起，柏林危机结束的事实，肯尼迪在“咨文”中也提出了与苏联谈判的问题，“我们准备在适当的时候

进行必要的谈判”，“我们将不惜做任何体面的努力来寻求这一问题的和平的、互相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从而可以改善我们同苏联的关系”。

在肯尼迪执政期间，美国的空间研究取得了较大成就。1961年5月，肯尼迪宣布，在这10年的末尾，美国要把人送上月球。为此，美国国家航空和航天局制定了水星计划，研究超重发射、空间失重和驾驶员重返大气层等问题。1961年5月，小阿兰·谢泼德成为进入太空的第一个美国人。为此，肯尼迪在“咨文”中还着重强调，在过去一年，“我们经过国会的批准在外层空间方面作了一番巨大的新的努力，我们的目的不仅是要首先登上月球”，是要“发展我国和其他国家在空中和大气层领域内的技术和权威。我们在进行这种努力方面的目标是奠定美国和自由世界在科学、商业和合作的新边疆的地位，我们国家是首先探索月球的国家之一”。



## 党的情报工作者李克农逝世

李克农，曾用名李泽田、李震中、峡公、种禾。1899年9月15日出生于安徽省巢县烔炀镇一个职员家庭。

1910年，李克农进入芜湖安徽公学（后改为安徽

省立第二农业学校)读书。1917年他到了北京,在《通俗周报》做发行工作。1919年任安庆(国民日报)副刊编辑。1921年任六安县政府第二科科长。1925年在芜湖参与创办民生中学,曾任校长。1926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其间曾加入中国国民党。1927年3月任国民党芜湖县党部宣传部部长,从事地方群众工作以配合国民革命军北伐。

大革命失败后,1928年李克农到达上海,先后筹办《铁甲车报》、《老百姓报》,两报先后被国民党当局查封。后来李克农又担任了中共沪中区委宣传委员,并从事秘密情报工作。1930年春,参加周恩来领导的中共中央特科工作。1931年4月,他及时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的紧急情报转报上级,使中共中央机关免遭国民党当局的破坏。同年冬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政治保卫分局执行部部长,后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部长。

1932年,李克农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分局局长、红军工作部部长。长征到达陕北后,他又担任了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负责与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的联络及白区秘密交通工作。1936年1月底2月初,李克农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在洛川先后与张学良、王以哲谈判,达成停止内战合作抗日的口头协议。4月9日,陪同周恩来与张学良举行延安会谈。西安事变发生后,任中共赴西安谈判代表团秘书长。1937年1月,

又作为红军代表和张学良、杨虎城代表一起，赴潼关与国民党中央军代表顾祝同进行停止内战的谈判。同年 2 月，在西安组织领导中共办事处。抗日战争爆发后，历任八路军驻上海、南京办事处处长，八路军总部秘书长，中共中央长江局秘书长，协助周恩来、叶剑英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1938 年赴桂林，任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处长。1941 年春回到延安，任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1942 年，兼中共中央情报部副部长。1943 年，兼任西北公学校长。1945 年，出席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解放战争时期，于 1946 年 1 月出任北平军调处执行部中共方面秘书长。后主持中共中央社会部工作。长期以来，为掌握敌情和防止反革命破坏，做了大量艰巨的工作，建立了卓越功绩。

1949 年 9 月，李克农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外交部副部长、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情报部部长。1951 年，与乔冠华等领导中国人民志愿军谈判代表团参加朝鲜停战谈判。1953 年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1954 年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出席争取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日内瓦会议。1955 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同年担任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是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第一、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1962 年 2 月 9 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 62 岁。